

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重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庄 有 为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作为毛泽东思想萌芽时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它的形成过程同样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则是它的集中概括，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在评论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下简称《分析》）一文时，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种倾向是孤立地、人为地拔高，绝口不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比较普遍流行的是这种倾向。在介绍、评述《分析》时，对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其他领导人的著述绝口不提，孤立地评论《分析》是“党在大革命时期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代表了党在这个时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等。随着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恢复，近年来这种倾向已引起人们的注意并正在克服之中。另一种倾向是贬低《分析》的重要的历史价值，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初步形成过程中的一般性文章，没有突出它的重要历史地位。

这种倾向的出现，同如何认识《分析》一文中关于无产阶级是革命领导力量的论述有直接的关系。如郭罗基在《红旗》杂志一九七九年第三期上发表的《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一文中提到《分析》时说，“一九五一年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同志又作了很大的改动，增加了关于工人阶级领导的问题”。既然工人阶级领导问题的论述是后来“增加”的，而且这个问题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么，《分析》的重要价值在哪里？是否还能说《分析》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作了比较完整的概括？这些问题引起了理论界的重视。

如何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认识《分析》一文中关于无产阶级是革命领导力量的论述，是本文想要研究和探讨的主题。

如何认识《分析》一文中关于无产阶级是革命领导力量的论述，在郭文发表以前，认识是一致的，是肯定的。郭文发表后，人们有了不同的意见。郭文是从《分析》一文多次发表、多次修改的情况来提出问题的。所以，为了搞清问题，有必要把不同版本的《分析》加以比较，以弄清修改、变化的情况。

《分析》最早发表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四期上，这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政治部办的刊物；接着，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出版的《中国农民》第二期上发表，这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办的刊物；不久，又在同年三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国

青年》第一百十六、一百十七期上发表，这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办的刊物。现据《中国农民》和《中国青年》的影印本先把一九二六年二、三月的两个版本作一简略的比较分析。这两个版本在基本内容、观点方面和文字结构、段落方面，大体上是相同的。修改的地方主要是：第一，《中国青年》上发表的《分析》对个别段落作了删节，文字更加精炼了。如第一段分清敌友的问题，由原来的四百二十一字压缩为一百八十八字，删去了“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要分清敌人与朋友呢，却并不是容易”，“在军队中，未有他的响导领错了路而可以打胜仗”等文字。第二，《中国青年》上发表的《分析》，对个别提法作了修改，使观点、提法更加准确了。如国家主义的阶级性质，在《中国农民》上发表时，在分析中产阶级时提到“这个阶级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其政治的主张为国家主义”。把国家主义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是不妥当的。《中国青年》发表时，修改为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在分析大资产阶级时提到“其政治主张之代表为国家主义”。

当然，《分析》在一九二五年冬、一九二六年春的几个版本中，也有些表述不够精确的地方，如同我们看待当时的其他历史文献一样，必须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修正。一九五一年《毛泽东选集》出版时，曾对某些表述作过一些修改。现就一九二六年三月《中国青年》上发表的《分析》与一九五一年《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中的《分析》作一简略的比较、分析。这两个版本在基本内容、基本轮廓方面，大体是相同的。修改的地方主要是：第一，《毛选》中的《分析》增加了各阶级所代表的经济关系即代表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方面的内容，如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一段，增加了“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中产阶级一段，增加了“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工业无产阶级一段，增加了“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一九二五年冬、一九二六年春的几个版本中，把代表封建生产关系的大地主与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买办阶级都列为大资产阶级，把代表封建生产关系的小地主与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民族资产阶级都列为中产阶级。收入《毛选》时，关于革命对象一段，明确提是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不笼统提大资产阶级；关于中产阶级一段，删去了有关小地主的内容。这样一增一删，使对各阶级的分析更为精确了。第二，一九二五年冬、一九二六年春的几个版本中，对各阶级分析时，有各阶级人数的估计数字，在分析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后还有一份表格，从阶级、人数、对于革命的态度三方面将所述内容加以概括。由于当时的人数估计不够精确，收入《毛选》时，将有关各阶级人数估计数字和表格均删去。第三，关于工业无产阶级，原来的提法是“工业无产阶级虽不多，却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在表格中，工业无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概括的提法是“主力军”。修改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以上就是《分析》一文前后几次修改变化的基本情况。

二

既然一九二五年冬、一九二六年春发表的《分析》中，对工业无产阶级只是提“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主力军”，没有提“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那么，能不能据此认为毛泽东同志当时没有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没有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分析》一文没有什么重要的历史价值了呢？我认为不能只从个别词句孤立来看，必须从《分析》全文总的精神来看，必须联系《分析》发表前后的其他文章（指一九二五年冬到一九二六年写的《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国民党右派分离原因及

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和《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来考察,当时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肯定是有,那种仅仅根据个别词句、提法就断定毛泽东同志在大革命时期没有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想法,显而易见是错误的。这里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说明:

首先,从《分析》总的精神来看,是肯定无产阶级领导的。《分析》指出:“无论那一个国内,都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五等人。……五种人各有不同经济地位,各有不同的阶级性。因此对于现代的革命,乃发生反革命,半反革命,对革命守中立,参加革命和为革命主力军的种种不同态度”^①。从全文看,对工业无产阶级评价最高,提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但很“集中”,“经济地位低下”,“特别能战斗”,“做个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在民族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②。从全文来看,当时毛泽东同志不可能主张由能够“参加革命”的半无产阶级、“对革命守中立”的小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更不可能主张由“半反革命”的中产阶级来领导革命,合乎逻辑的推论必然是由特别“集中”、“特别能战斗”的工业无产阶级来领导革命。

其次,“主力”、“主力军”的提法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与领导力量的含义是近似的。从《分析》总的精神来看,是肯定无产阶级领导的,尽管当时使用的是“主力”、“主力军”的提法,实际上与领导力量的提法是一致的。在当时的革命文献里,“主力”、“主力军”的提法是相当普遍的,如恽代英同志说:“我们常说工人是革命的力量”,是“革命的主要势力”^③。我们“认定了革命的主力是无产阶级”^④。任弼时同志说:“现在中国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当然为最大多数的农民和社会地位最苦的工人,而这两种中间最有革命力量的还是产业工人。”^⑤肖楚女同志说:“中国共产党把无产阶级认为革命的主力军,是不错的——因为历来的国民革命运动的事实证明,都是知识分子和商人资本家容易与帝国主义妥协,而唯有工人的奋斗能坚持到底。”^⑥也有把“主力”与领导力量统一提的,如瞿秋白同志说的:“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里无产阶级的领袖地位和政治指导,不但实现于实际行动,而且在这斗争里证实了无产阶级是解放中国民族的主要力量。”^⑦这些都说明“主力”和领导力量在当时是一个意思,是一致的。

再次,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在强调农民问题重要性的同时,明确指出:“我总觉得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⑧这里,突出强调的是“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的思想。可见,联系《分析》发表前后的其他文章考察,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在当时肯定是有。

综上所述,可见只从个别词句孤立地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是不对的。必须纵观全文的精神实质并联系同时期其他著作作统一的考察,这样的思想方法才是正确的。只从个别词句的提法得出结论说毛泽东同志当时没有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乃至说没有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这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贬低《分析》的重要历史价值,把《分析》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初步形成过程中的一般性文章,忽视它的重要历史地位是错误的偏向。

[注]

①② 《中国青年》第118—117期,1926年3月13日 ③ 但一(恽代英):《青年工人运动的注意事项》,《中国青年》第18期,1924年2月16日 ④ 恽代英:《与李璜卿君论新国家主义》,《中国青年》第73期,1925年4月4日 ⑤ 弼时(任弼时):《上海五卅惨案及中国青年的责任》,《中国青年》第81期,1925年6月23日 ⑥ 抽玉(肖楚女):《国民革命与“专一”、“诚意”》,《中国青年》第103期,1925年11月28日 ⑦ 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新青年》第3号,1929年3月25日 ⑧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1926年9月1日。转引自《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